



论仰韶时代嵩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赵保佑 阎铁成

摘要:仰韶时代的嵩山文明是在裴李岗时代农耕文明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的,嵩山地区的郑州大河村、荥阳清静沟、宜阳苏羊、荥阳青台、巩义双槐树等考古遗址的新发现,为嵩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证据链,促进了中原地区农桑社会的形成,与大型核心聚落的涌现,推进了本土文化从“聚落”走向“国家”的关键转型。“观象授时”与“建中立极”,开辟了建立政治秩序的路径,使嵩山地区文明化进程呈现出“敬天法祖、重贵轻富、秩序为重、务实执中、生生不息”的连续性发展轨迹。

关键词:仰韶时代;嵩山文明;文明化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4-0017-10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中原地区的深入开展,环嵩山地区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仰韶时代的嵩山文明是在裴李岗时代农耕文明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的,尤其在距今6000—5000年间,涌现了以大河村、清静沟、苏羊、青台、双槐树等遗址为代表的规模宏大、内涵复杂的大型聚落群。这些聚落不仅是华夏先民人口与财富的集中地,更是早期中国制度、技术、观念创新的摇篮。这些以聚落考古为基础的物质遗存新发现,为我们解释嵩山地区连续的、具有内部驱动力的文明化进程提供了考古学证据链。本文试从生态环境支撑、农桑社会分工、社会结构分化、空间秩序形成及社会秩序建立等维度,探讨仰韶时代嵩山地区如何从文化区逐步发展为具有强大整合力与创新力的“文明核心区”,如何在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融汇中,逐渐形成独具优势的区域文明——嵩山文明;同时进一步分析其在整个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如何在文化上孕育了“早期中国”的基因,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农桑社会形成

仰韶时代嵩山地区能够成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适宜人类生存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起到关键支撑作用。这一优势不仅为农业发展、人口增长和聚落扩张提供了基础,更营造了中原地区独特的人文生态,为连续不断的文明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环境基础。

仰韶时代嵩山地区的气候,处于全新世稳定的大暖期(约公元前8500—公元前3000年)环境中,亚热带北界北移,气温略高于现代。这是中国史前气候最适宜的时期之一,其温暖湿润的特征为中原地区的农业、动植物生长及人类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竺可桢等学者的研究^①显示,仰韶时代中原地区的年均气温较今高约2℃,冬季气温较今更高(高3—5℃)。这种温暖气候使亚热带北界大幅北移,嵩山地区的年均气温接近今信阳等亚热带地区。例如,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发现了亚热带植被类型水蕨孢子^②,

收稿日期:2026-04-20

作者简介:赵保佑,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南郑州 451464),主要从事文明起源研究。阎铁成,男,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河南郑州 450006),主要从事中原文化研究。

说明当时嵩山地区为暖湿气候。同时,嵩山地区位于黄河中游与淮河上游的过渡地带,仰韶时代的降水量较今天丰富,黄河中下游地区湖泊众多,如黄河、伊河、洛河等河水量充足,仰韶时代中晚期的郑州大河村遗址发现了莲子等水生植物遗存^③,说明当时附近有广阔的洼地或湖泊,水草丰美,能为家畜饲养提供充足的饲料。

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季风较强,雨量充沛,植被茂盛。距今4000年左右全新世大暖期内的降温和大洪水事件,带来次一级的气候波动,但中原地区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对此变化不太敏感,气候整体波动较小,保持了相对的稳定^④。这种稳定性使农业生产得以持续发展,没有因极端气候导致文明中断。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却遭受异常气候的影响,导致海岱地区龙山文化,长江中下游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文明化进程中中断^⑤。

嵩山呈锥体状,凸卧在黄淮平原西侧的低山丘陵之中,主体山脉为中低山,海拔虽不算太高,但在平原丘陵中仍显雄壮。其间呈放射状流出的河流,分别流入古河水、淮水、济水,使其成为中原地区水网最为密集的地区。嵩山地形位处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之交,纬度位处中纬度与高纬度之交,气候属暖温带与北亚热带之交,是典型的生态过渡带。嵩山地区的地理环境为农业、聚落和交通提供了多样化的支撑,地形多样,适合农业发展与聚落形成。嵩山地区的郑州东南为黄淮海冲积平原西部山前盆地,地形包括平原、河流谷地和低山丘陵。这些地形为农业提供了多样的土地类型,山前洪积-冲积平原,土壤以黄土为主,比较肥沃,地势平坦,适合粟作农业;河流谷地,水源充足,郑州裴李岗遗址发现稻谷遗存^⑥,证明这里适合种植水稻;低山丘陵,适合种植果枣、栗、桑等树木和采集野生植物,以补充农业资源的不足。

“天下之中”过渡地带的资源优势,使以嵩山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成为资源交汇的中心:西北的牛、羊等畜牧资源,通过黄河支流渭河等输入中原;东北的粟、黍等农业资源,通过黄河输入中原;西南的铜、玉等矿产资源,通过秦岭山脉输入中原;东南的石器、陶器、玉器等手工业

产品,通过淮河输入中原。这种资源交汇的优势使中原地区成为“文化熔炉”,促进了凌家滩文化、屈家岭文化、红山文化等不同文化在本地的交流与融合,为嵩山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多元的文化基因。如在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晚期的文化堆积层中,不仅出土有细泥灰陶尊、背壶、宽肩罐、敛口盂等具有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器物,还出土有陶瓦足盆形鼎、罐形鼎、簋、釜、双腹碗、浅盘粗柄镂孔豆、高圈足杯等属于江汉流域屈家岭文化风格的器物^⑦。又如宜阳的苏羊遗址出土了横装宽扁足盆形鼎、彩陶纺轮等具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诠释了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已北进至此,与仰韶文化深度融合;苏羊遗址出土的虎头形石雕,与红山文化半拉山墓地的钺端饰极为相似,印证了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交流^⑧。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融合,使嵩山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熔炉”。

考古学家严文明指出,中原地区的地理气候环境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摇篮”,其连续稳定的优势,使这里成为华夏民族的“根”之所在^⑨。从考古调查看,优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造就了仰韶时代文明生长演进的独特条件,嵩山地区已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数量众多,分布密集,多位于水源地附近,方便生产和生活。许多遗址都是从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延续时间长,从距今7000年到距今4500年,完整演绎了仰韶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辉煌的全过程。

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都是以农业和纺织作为文明发展的基础,农业和纺织解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问题。从嵩山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生产力的提升促进了农业和丝织业的进步。农业和纺织业分工的细化、生产工具的革新、定居形态的完善及精神信仰的物化等,彰显了嵩山地区从裴李岗时代的“原始农耕萌芽”,到仰韶时代“成熟农桑文明”的发展过程,形成一个系列的演进链条,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考古发现显示,裴李岗文化多个遗址出土的炭化粟粒证实裴李岗先民已掌握粟类作物的种植技术,并形成了“种植—加工—储存”的完整农业生产链条。先民已使用石铲、石斧砍伐草木,使用石铲翻耕土地,种植粟等旱作作物,

这是嵩山地区最早的旱作农业证据;加工工具方面,配套使用石磨盘、石磨棒,用于加工粟类粮食,提高食物利用率;储存方式上不断改良,建造圆形或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屋内设有窖穴,说明先民已具备粮食储存的意识。

距今约7000—5000年前仰韶文化继承并发展了裴李岗时期的农业技术,进入以农业为主导的定居社会。农业生产成为经济核心,洛阳西高崖遗址出土的稻谷痕迹^⑩说明,农作物种植品种开始多样化,除种植粟外,开始种植稻、黍等作物。锯齿刃石镰、双弧刃石铲的出现,说明生产工具也不断革新,石器制作更加精细,提高了耕作效率。部分地区出现泥质红陶三足钵等陶器,用于储存粮食和液体。洛阳堽李遗址的水井,口径1.6米、深6.1米^⑪,说明水利灌溉已经萌芽,在仰韶文化晚期出现水井,为农业灌溉提供了条件,解除了农业对江河水的依赖。

农桑分工逐渐细化,从“男女协同”转变为“专业分工”。裴李岗文化时期,男女劳动分工已初步显现,为仰韶文化的专业分工奠定了基础。男性使用石斧、石铲、木弓,主要负责耕作、狩猎,贾湖遗址男性墓随葬品多为石铲、石斧等石制工具;贾湖遗址女性墓随葬品多为石磨盘、陶纺轮等陶制工具,显示女性主要负责粮食加工、纺织等^⑫。仰韶时代,农桑分工进一步细化,出现了专业化的手工业者。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纺轮,说明纺织已成为独立的生产活动。裴李岗遗址出现的用于缝制衣物的骨针^⑬,反映了衣物制作的精细化。仰韶遗址中陶窑群的出现,反映了制陶技术专业化,陶器制作已从“家庭副业”转向“专业作坊”,鼎、钵、盆、罐等陶器种类增多,绳纹、篦点纹等纹饰更加复杂,说明制陶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生产工具的革新反映了粮食加工从“简单磨制”到“精细加工”的显著进步。裴李岗文化的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制作技术已趋于成熟。典型器具包括鞋底形四足石磨盘、圆柱形石磨棒、用于收割的锯齿刃石镰以及用于翻土的双弧刃石铲。在加工技术方面,石器表面光滑,刃部锋利,表明当时的磨制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⑭。仰韶时代,生产工具进一步革新,复合工具和专业化工具进

一步发展。如石铲、石镰等石器开始与木柄相结合,提高了耕作与收割效率。同时,出现了如陶纺轮、陶拍、骨针等具有专门用途的工具,应用于纺织、陶器纹饰拍制和衣物缝制等方面。这些工具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生产活动已呈现初步的专业化发展趋势。

裴李岗遗址中发现了纺织遗存^⑮,荻沟北岗遗址中发现了陶制的蚕蛹^⑯。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则展现出更发达的丝绸纺织技术。20世纪80年代,在青台遗址距今5500年的仰韶文化层中发现了两座保存完好的瓮棺墓葬,瓮棺内的尸骨上黏附有褐灰色炭化物品碎片及块状织物结块,经鉴定,这些炭化的物品残片具有丝纤维光泽、单纤维排列平行、无捻度等特征,确认为桑蚕丝纺织物品。这是蚕茧进行多粒缫制加工为长丝纺织而成的,既有平纹组织的纱,也有左右互相绞缠后的椒孔组织的罗,纱和罗是需要织机纺织的,说明当时青台人已经有了原始织机。青台遗址出土的罗已经过炼染,呈浅绛色,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带有色泽的丝织物^⑰。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长6.4厘米、呈“C”形、与现代家蚕结构一致的“牙雕家蚕”,实证了仰韶时代中原地区已驯化家蚕^⑱。在荥阳楚湾遗址也发现了玉雕蚕蛹,实证了约5300年前已有养蚕缫丝技术^⑲。

二、核心聚落出现

农桑发展为嵩山地区文明进步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撑。从距今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开始,嵩山文明的发展开始加速,重要的标志之一是人口的集中,出现了面积数十万平方米甚至超过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推测应有王一级的领导者,普通村落逐渐整合为一个大的整体,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等级阶层关系。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聚落的向心式社会结构,正是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邦”“国”,由此开启了“万邦林立”的邦国时代。考古发现显示,作为仰韶文化核心区的嵩山地区经典地展现了这一历史变化。从距今约7000年到距今4800年,聚

落形态经历了一场从“平等村落”到“超级古国”的演变。

首先,从演变过程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距今约7000—60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规模通常只有几万平方米,外形多为圆形或不规则形。先民们极其看重集体,聚落中心往往有一座“大房子”,周围簇拥着一圈小型居室。这种“凝聚向心式”布局,说明当时社会基本平等,氏族公社是最核心的生产和生活单元。到了早期偏晚阶段,部分聚落外围开始挖掘壕沟。比如灵宝城烟遗址出现了由墙壕组成的防御体系,这是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早期信号。

第二阶段:距今约6000—53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增长,聚落面积普遍达到数十万平方米。原先以“大房子”为核心的紧密布局开始瓦解,社会的基本细胞逐渐从庞大的“氏族”向较小的“家庭”或“大家族”过渡,呈现出规模暴增与“金字塔”等级初现的特点。区域间的聚落出现严重分化,特大型核心聚落—大型中心聚落—中小型普通聚落形成了类似“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距今约5800年的宜阳苏羊遗址,很好地展现了这一时期的聚落扩张状况。规模超60万平方米,开始修筑双重环壕。其精美连间房址和大型礼仪建筑,折射出社会分层和权力的初步集中^⑧。距今约5300年的郑州西山古城^⑨,是中国出现的年代较早的史前版筑城址。它采用近圆形规划和方块版筑法,带有强烈的军事防御色彩,这意味着为了保护聚落内的财富和特权,早期的“战争”或冲突可能已经催生了具有号召力的首领。

第三阶段:距今约53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聚落外围常常环绕着2至3重巨型环壕,聚落内有宫殿区、居住区、墓葬区、作坊区等功能区划分,甚至出现了象征王权的“一门三道”和“前朝后寝”格局,呈现出重城叠壕式“古国时代”的都邑格局。

荥阳清静沟遗址和巩义双槐树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都邑级”聚落的典型代表。双槐树拥有三重环壕、大型院落和最早的瓮城雏形,是统领一方的“古国”政治中心;清静沟遗址则发现了四重环壕和大规模的版筑夯土墙^⑩,将中

国版筑技术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荥阳汪沟遗址和荥阳青台遗址,是强大的区域中心。汪沟遗址拥有74万平方米的大环壕和2万平方米的超大型红烧土广场,是举行大规模公共集会的场所^⑪;青台遗址则展现了极其严密的居住、墓葬、祭祀、作坊分离的功能区^⑫。

大型都邑级聚落的出现说明,这是嵩山地区文明快速发展阶段,也是嵩山区域文明在中华文明中影响力持续提升的时期。这些大型聚落形态发生了质的改变,标志着中原地区正式迈入早期国家门槛。

其次,从聚落结构特征及分类来看,距今约53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嵩山地区的聚落形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先民们之间不再是简单的“互助模式”,而是开始大兴土木,建环壕、筑城墙、划功能区,聚落结构特征可以概括为“重防御、强规划、显等级”。这些聚落形态共同勾勒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古国时代”图景。

最后,这类都邑级超级聚落多具有以下明显特征:一是多重环壕与礼制萌芽,聚落规模巨大,是整个聚落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已经具备了早期国家的“都邑”性质。如巩义双槐树遗址,彰显出“河洛古国”的宏伟蓝图,面积达117万平方米,拥有三重大型环壕,防御与防洪功能兼备。瓮城内壕北部是占地1.8万平方米的中心居址,修有围墙,并出现了两道错位门道的加厚围墙,即中国最早的瓮城结构。南部的大型院落基址中,发现了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一门三道”建筑格局,这成为后来中国历代高等级宫殿的标准配置。拥有经过严格规划的1700余座公共墓地和大型夯土祭坛,社会等级分化十分明显^⑬。又如荥阳清静沟遗址有着精巧的设计规划。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仰韶文化中期版筑城址,由四重环壕合围,面积达55万平方米。在第三条壕沟内侧发现了夯土墙体^⑭,将我国版筑城墙的年代直接推进到了5000多年前的古国时代早期,展现了高超的建造工艺。二是这些都邑级超级聚落明显表现出城池形态与社会分化的特点。如郑州西山遗址,平面呈圆形,采用“单城墙+双环壕”的结构,城墙采用方块版筑法,墙角加宽

收杀,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⑦。荥阳汪沟遗址被学界认为是豫中地区的“大心脏”,面积达74万平方米,是豫中地区仰韶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周围有多重环壕护卫。考古发现了面积达2万平方米的大型红烧土广场,以及超过200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基址^⑧,说明这里曾是先民举行大规模公共活动和集会的核心场所。多重防御体系说明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具备强大动员能力的统治阶层。三是表现出规划严密的环境聚落的特征,有些遗址虽然没有修筑宏大的城墙,但其精密的功能分区和特殊的信仰建筑,同样折射出当时社会的高度组织化特征。如荥年青台遗址,核心区域由面积约31万平方米的三重环壕层层合围,出入口设计各异,展现了成熟的给排水与防御工程思维。先民们甚至已经懂得使用土坯砌筑房屋。在遗址东部发现了由9个陶罐摆成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及黄土圆丘^⑨,这不仅是目前中国最早的观象授时实证之一,更是先民祭祀天地、沟通神灵的圣地。又如宜阳苏羊遗址面积超60万平方米,拥有内外双重环壕。聚落从仰韶文化早期到晚期不断向南扩张,环壕也随之加宽改造,体现了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居住区内不仅发现了面积达100平方米的大型礼仪性半地穴式建筑,还出土了墙面和地面涂有类似现代“水泥”面层的精致连间房址^⑩,显示了当时较高的建筑水平。

总之,透过仰韶时代嵩山地区的大型聚落遗存,可以清晰地看到华夏先民的聚落规模不断扩大、内部布局日趋复杂化、中心建筑趋于礼仪化的趋势。仰韶文化中晚期嵩山地区社会从聚落到古国的发展脉络和三个发展特点也清晰地彰显出来:一是技术飞跃,从简单的环壕到成熟的版筑夯土城墙,先民的建筑水平不断提高;二是阶层分化,从“一门三道”的特权建筑到大规模公共墓地的规划,说明社会资源已经高度集中,特权阶层和礼制已经诞生;三是宇宙观的萌芽和发展,青台的“北斗九星”祭坛和双槐树的牙雕蚕,证明了仰韶先民不仅在改造物质世界,更在构建属于自己的宇宙观与精神信仰体系。这些散布在嵩山地区的聚落遗址,正是华夏文明主根脉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三、政治秩序奠基

仰韶时代是嵩山地区本土文化从“聚落”走向“国家”的关键转型期。在这一时期,政治秩序的建立并非单纯依赖武力征服,而是通过构建一套“天人合一”的意识形态与空间规范来实现。近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郑州大河村、巩义双槐树、郑州西山、荥年青台、荥阳清静沟等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华夏先民通过“观象授时”和“建中立极”的智慧构建社会政治秩序的清晰脉络。

“观象授时”即先民通过对天象的系统观测掌握了历法规律,赋予了统治阶层“通神”的合法外衣,揭示“天之序”。“建中立极”即通过营造中轴对称、层级分明的都邑空间或聚落中心广场,将宇宙秩序投射于人世,二元互动,最终体现为“王者居中”的“人之序”,这样“天人合一”,就形成了统治的合法性。发展到中原龙山文化后期,这两者共同催生了中原地区早期的礼制规范,为夏商周三代成熟的青铜文明政治模式奠定了基石。

首先,“观象授时”是获取“天之序”神秘权力的基础。先民定居之后,粮食种植成为生活的基本来源,农业收成与天气情况紧密相关,在靠天吃饭的新石器时代,误了农时就意味着灭顶之灾。掌握天文历法,就等于掌握了生存命脉,更等同于掌控了与神明沟通的独家渠道。这种绝对的知识垄断,正是早期政治权力最核心的源泉。

在距今9000—7500年早于仰韶时代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出土了用丹顶鹤尺骨制作的骨笛,这是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可吹奏乐器^⑪,有学者认为其兼具“观象授时”的功能^⑫。骨笛多有7—8个音孔,音孔间距与日影长度存在严格对应关系,推测先民或通过“律管候气”法,即将律管埋入地下,通过管内灰分的飘动判断节气,用骨笛记录日影变化,进而制定历法。贾湖骨笛的音孔排列,与后世“夏历”的“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存在关联,“冬至”对应骨笛的“黄钟”音。这说明,早在仰韶时代之前,先民已掌握“冬至”是播种的关键节点,开始用“天文观测”

指导农业生产。

郑州大河村遗址是仰韶时代延续时间最长的遗址之一,距今约6800—3500年,其出土的彩陶纹饰包含大量天文元素,如太阳纹、月亮纹、星象纹等,反映了先民对天体运行的持续观察。彩陶钵上的太阳纹多为圆形,周围环绕放射状光芒,部分太阳纹内还刻有“日晕”,12个太阳外围环绕24道三角形光芒,可能象征“日、月、星”的天体系统。彩陶片上的月亮纹有“新月”“满月”“残月”三种形态,可能记录月相变化约29.5天为一个周期,这是早期“阴历”的基础。部分彩陶上的“星座纹”,象征北斗七星和二十八宿的雏形,可能是先民对星空的分区记录,用于指导夜间狩猎、祭祀活动。大河村遗址的彩陶纹饰,本质是天文历法的视觉化表达,将抽象的天体运行转化为可感知的符号,便于传承和记忆,开创了中国古代观象授时的先河^③。

无独有偶,几乎与大河村彩陶天象图纹出现的同时,在荥阳青台、巩义双槐树、郑州西山等遗址,均发现了先民们用陶罐摆出的北斗九星图案。在青台遗址的祭祀广场上,发现9个陶罐组成的“北斗九星”,9个陶罐按“北斗九星”形状排列,其中7个大小不一的罐子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排列,另外还有两个罐子分别放置在两侧,即传说中的左辅、右弼。祭坛西部及东南部不同方位摆放4个瓮棺将九星罐和圜丘半包围,南部有一个祭祀坑,内置一具非正常死亡的骨架,祭祀区北部、西南部、东部均有较多疑似地白的遗存,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北斗九星祭坛^④。值得关注的是,斗柄指向冬至日出方向,与后世“斗柄北指,天下皆冬”^{[1]70}的规律相一致。更关键的是,北斗九星即“天极”遗迹上方正对北极星,形成“北斗绕极”的天体运行模型,体现了“北极为中心、北斗为枢机”的“天地之中”宇宙观。北斗九星与周边象征“天”的黄土圜丘、象征“地”的瓮棺,形成“天、地、人”合一的祭祀格局。此处可能是“祭天授时”的重要场所,古人通过北斗斗柄的指向确定“冬至”“春分”等关键节气。

仰韶时代嵩山地区的观象授时体系,不仅是“认知天文”的活动,更深度融入了社会生活与礼制构建。先民通过观测北斗斗柄指向、日

影长短、月相变化,确定了“播种”“收割”等农业生产节律,如“斗柄东指,天下皆春”^{[1]70}即为农业播种的重要信号。北斗九星遗迹多与祭祀广场及象征祖先崇拜的瓮棺并存,表明“观象授时”已是“沟通天地”的核心仪式,如“冬至祭天”是先民向天帝汇报历法执行情况的重要形式,与祭祀礼仪相关。由于对“观象授时”权力的垄断,只有部落首领能解读北斗纹饰,这种对天文知识的独占权逐渐成为早期王权的象征,如双槐树遗址埋有北斗九星的大型房址F12,被推测为部落首领“观象授时”的重要场所。

嵩山地区多处仰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显示,天文、祭祀与祖先崇拜相结合,可以管窥华夏先民中心聚落精神信仰的多元融合特征。先民将天文观测与农业生产结合,使天文、祭祀与祖先崇拜相互交织,形成了早期宇宙观的重要内涵。这一图景与《尚书·尧典》“观象授时”的记载相互印证,说明当时先民们已掌握包括北斗授时、日影观测、星象解读在内的系统的观象授时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农业生产、礼仪祭祀、王权构建。这些成果不仅将中国天文历法史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更推动了“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形成。天文观测不再是自然现象的记录,而是人与天地沟通的方式,为后续“夏历”“二十四节气”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贾湖骨笛的“律管候气”到大河村、青台、双槐树等遗址的北斗九星,仰韶时代持续发展的观象授时实践,本质上是中华文明“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先民依托“天文观测”建立了“时间秩序”,进而形成了如部落分工、礼仪制度之类的“社会秩序”,最终推动了“文明”的诞生。

其次,“建中立极”是规训“人之序”的空间实践。当权力的种子播下后,如何用一套看得见、摸得着的规则来维系它?仰韶先民的答案是“建中立极”。通过在空间布局上强调“居中”“对称”和“层级”,人世间的等级尊卑秩序被巧妙地合理化、自然化。

巩义双槐树遗址,整个都邑被内、中、外三重环壕严密拱卫,这种层层递进的防御体系,即彰显出王权的隐喻,不仅在物理层面保护了统治者,更在心理层面给下层施加了强烈的压迫

感。遗址中心发现了一座面积达数千平方米的巨型夯土建筑群。其中,核心院落呈现出标准的“一门三道”格局:中间是正门,两侧设偏门。遗址在空间规划上将“建中”理念发挥到了极致。在数千年后的二里头宫殿、殷墟遗址乃至明清紫禁城中依然能看到这种规制的影子。“中”即为尊,“三”象征万物。双槐树的统治者坐在“中心之中心”,俯瞰着外围的庶民,一套成熟的国家机器已然呼之欲出。

荥阳青台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仰韶时代性别分工与社会管理的细化,渗透在日常的生产管理之中。该遗址不仅拥有复杂的多重环壕,还出土了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罗、纱等丝麻织物遗存,表明仰韶时代纺织业的兴起,意味着女性劳动力主要被固定在特定的家庭或作坊中,而男性则更多转向农耕、筑城和战争。这种基于性别的“社会分工制度化”,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使得一部分人可以脱离生产,专门从事管理和礼仪活动。青台的纺织遗存,从社会底层的结构上,印证了仰韶文化晚期社会管理的精细化。

最后,“观象授时”与“建中立极”的结合,促进了早期国家的形成,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政治基因”。

“观象授时”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需要,更是神权政治的工具;“建中立极”则是将这种宇宙秩序复制到地上,用空间的等级来固化人世的权力。面对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起源格局,嵩山地区之所以能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关键在于它最早完成了政治秩序的奠基。通过“观象授时”,华夏先民将变幻莫测的自然力量转化为可以推演的“天道”,以此赋予世俗权力以神圣的光环;通过“建中立极”,他们又将无形的天道转化为有形的宫室、城壕与礼器,让尊卑有序的观念深入人心。

在这个阶段,嵩山地区不同于良渚文化那样出现了巨大且众多的玉器和巨型水利工程,也不同于红山文化出现了较多泥塑女神和祭坛,嵩山先民整体展现出一种务实、理性的特质。他们关注的是“秩序”本身,大量的物质财富不是用于神灵祭祀,而是用于让人们的生活持续下去,各安其位,生生不息,让王权超越神

权,使社会和谐运转。这种源于“天地秩序”的政治智慧,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夏商周三代。二里头的“九宫格”城市布局、殷商甲骨文的占星记录、西周的天命思想,滥觞于仰韶时代嵩山地区的“观象授时”与“建中立极”。

观象授时对天文气象规律的掌握,构成权力的来源。“天之中”被天文观测所确认,通过神秘仪式和垄断“绝地天通”的阐释,投射到“地之中”,在“地之中”搭建权力的中心。大河村的星图、双槐树的北斗、西山的城墙、青台的织机、汪沟的骨蚕与丝织品痕迹、清静沟的瓮城等考古遗存,都雄辩地证实,在嵩山地区的“天”“地”交汇中,华夏先民确立了自己对宇宙、对社会的最初认知框架。这个框架稳固地支撑起了夏商周三代的青铜文明,更贯穿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

四、文明制度开启

在考古学与人类学视野中,文明的诞生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复杂且充满波折的“文明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便是“制度化”的建立。它意味着人类社会打破了原始氏族的血缘温情,开始依靠一套被全体成员认可的、具有强制力的规则、等级、礼仪和权力架构来维持运转。

在距今约6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嵩山地区社会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制度化”变革,即从“酋邦”向具有严格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公共权力和礼仪规范依托的“早期国家”演进。以下以青台、大河村、西山、双槐树四个典型遗址为核心线索,通过剖析其环壕城墙、功能分区、宫殿宗庙及祭祀遗迹,勾勒出嵩山文明从“天下大同”走向“制定礼乐”的完整演进轨迹。

第一,在探讨文明起源时,公共工程的建设规模往往是衡量一个社会组织能力的理想标尺。荥阳清静沟遗址,以其精密的防御体系和建筑技术,向我们展示了仰韶文化中期社会动员能力的质变。

清静沟遗址现存合围面积55万平方米,核心布局特征是拥有四重环壕,并在由内向外的第三条壕沟内侧,发现了夯土墙体^⑤。这一发现

至关重要,它将我国版筑技术出现的年代明确地推进到了5000多年前的古国时代早期。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看,清静沟的城墙与环壕绝不仅仅是一堆泥土和几条水沟,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挖掘数十万平方米的壕沟并将土方夯实筑造成连绵的城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超级工程。它意味着当时的社会已经具备了高度组织化的大规模人力物力调配能力。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项工程,先民们必然发展出了一套超越氏族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层级”和“劳役分配制度”。同时,多重防御体系的出现,也暗示了当时不同聚落集团之间可能存在激烈的资源争夺。战争或冲突的常态化,进一步催生了严密的社会防卫机制和集权式的指挥体系,这正是早期国家机器雏形初现的强烈信号。

第二,距今约6800—3500年的郑州大河村遗址,为我们提供了微观社会管理的精细切片。大河村遗址文化层堆积深达数米,涵盖了仰韶文化产生、发展、消亡的完整过程,被誉为“仰韶文化的标尺”。大河村遗址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大河村并非普通村落,而是一座具有一定级别的“城”。遗址内存在坚固的城墙、环壕,且居住区、墓葬区、制陶区有着明显的区划。这种井然有序的“功能分区”,是城市管理制度的直观体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制陶区的独立存在,说明当时的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彻底分离出来,形成了稳定的生产管理制度和专业化的工匠群体。此外,大河村先民还在“仰望星空”中建立了早期的历法制度。遗址出土了大量绘有太阳纹、日晕纹、星座纹的彩陶,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天文学实物资料。对天象的系统性观测和记录,意味着先民们已经制定了较为原始的历法制度,用以指导农时,保障作为社会基石的农业经济稳定发展。而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搭建中,象征部落结盟或联姻的“彩陶双连壶”则反映了不同血缘氏族之间,可能通过结盟、联姻等方式,形成了更高层级的政治或军事联合体。

第三,荥阳清静沟遗址出土的器物显示,这是一座建于仰韶时代中期偏早的城,时间在距今约5800—5600年之间^⑧。清静沟城址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版筑城址,与同时期的

面积7.6万平方米的湖南城头山城址^⑨、12.5万平方米的江苏斗山城址^⑩相比,不仅建造技术更为先进,规模也更大。清静沟城址结构复杂,建筑技术先进,不仅把中国版筑城址的历史向前推进到了约5800年前,也反映了筑城者的强大组织能力,标志着国家组织已经出现。

第四,距今约53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西山古城,平面呈圆形,最大直径180米,面积约34500平方米,是中原腹地迈入“古国时代”的重要标志。其最令人惊叹的成就是采用了极为先进的“方块版筑法”建造城墙和城壕。如此宏伟且经过精密规划的防御工事,绝非聚落的家庭所能完成,它背后一定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公共权力机构。为了协调如此庞大的人口进行高强度劳动,社会必须有一套强制推行的“规章制度”,这标志着“管理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阶层分化已经达到了不可逾越的程度。不仅如此,西山遗址还揭示了当时极其残酷和严格的宗教祭祀制度。考古工作者在城墙、城门及房基等建筑基址下,发现了大量以鼎、罐等陶器为葬具的奠基坑。坑内多有幼儿或婴儿尸骨,部分骨骼不完整,显系被杀害肢解后用于祭祀的牺牲。此外,在一些废弃的窖穴中还发现了被腰斩的牛骨架、被捆绑的猪骨架,以及与兽类扔在一起呈挣扎状的人骨架。这些血腥的遗迹表明,当时的宗教已经不再是全民共享的巫术游戏,而是被少数统治阶级所垄断的、用来巩固自身权力和威慑民众的国家机器。通过这种制度化的暴力祭祀,统治阶层成功地在民众心中树立了绝对的权威。西山古城正是凭借这一套集“军事防御、行政强制、宗教神权”于一体的制度体系,成为当时区域内的中心要邑。

第五,距今约5300年,位于河南巩义的双槐树遗址,之所以被学术界称为“河洛古国”,主要在于其成熟的礼制与王权。三重环壕与宫殿基址,显示其应为嵩山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文明化进程的最高峰。总面积达117万平方米的超级聚落在“古国”中尤为突出。

双槐树的制度化建设,首先体现在其宏大而完善的城市规划上。遗址被内、中、外三重环壕严密包围,这种设计不仅具有实战防御功能,更体现了较高的礼仪化设计思维。在内壕北

部,两道围墙与壕沟合围成半月形区域,其错位布置的门道设计,被认为可能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瓮城”雏形,展现了先民们卓越的防御智慧。而在内壕中部,考古工作者揭露了一座面积达4300平方米的超大夯土建筑基址群。这里不仅有被称为“前朝后寝”的宫殿格局,而且其中一座大型院落呈现出典型的“一门三道”结构。这种高等级的门道遗迹,与数千年后的二里头一号宫殿、偃师商城乃至明清紫禁城在礼制上一脉相承。这一形制可以视为国家权力的专属符号。

此外,双槐树遗址还发现了类似后代“左祖右社”的夯土祭坛遗迹,以及用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这一切证明,双槐树已经脱离了单纯的氏族聚落形态,成为一个拥有成熟礼仪规范、严格等级秩序、强大区域控制力以及发达天文学知识的古国都邑。以双槐树为核心,以西山、点军台等城址为拱卫的聚落金字塔结构,正是早期中国国家机器高效运转的生动写照。

结 语

综上所述,在仰韶时代(约距今7000—5000年),嵩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原模式”道路。通过与同时期辉煌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对比,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它的特点与价值。

仰韶时代嵩山地区文明化的核心特点是它没有走“极尽物力”的祭神路线,而是呈现出“敬天法祖、重贵轻富、秩序为重、务实执中、生生不息”的连续性发展轨迹。从经济基础来看,嵩山地区以农耕为主。依托黄土高原和黄河阶地,以粟黍旱作农业为本,兼种水稻等,打下了农业的坚实基础。从权力结构来看,中原不依赖神权结构,而是依靠世俗的军事和行政领导力来管理社会,王权与军权结合,突出王权,奠定了后世“人本”和“祖先崇拜”的基调。从城址考古来看,尤其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出现了带有多重环壕、版筑夯土城墙和围垣分区的古城,秩序感极强,彰显了对社会秩序和管理的高度需求。从墓葬随葬品反映的社会风气来看,高等级大墓随葬品少见奢华的玉器,多是实用陶器,没有

厚葬之风,反对将财富挥霍在非生产性的祭祀上,质朴执中,重贵轻富。这条路低调、务实,却坚韧无比,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主干。与其大约同时代的红山文化,集族群之力制作精美玉器、修建大型祭坛积石冢,为神权主导型模式。良渚文明则属神权+王权混合型模式,建造庞大的水利工程。仰韶文化则像静水流深的江河,质朴、坚韧、包容,为中国后世数千年的文明探索出了可持续的文明演进模式。仰韶文化以其强大的世俗生命力,使文明得以连绵不绝地演进,最终融会贯通,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

注释

- 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 ②⑫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第447—455页。
- ③⑦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页,第381—385页。
- ④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
- ⑤参见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王青:《距今四千年前后环境灾变与洪水事件的新思考》,《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23日。
- ⑥钟华:《裴李岗遗址2018—2019年度浮选出土植物遗存分析》,裴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与裴李岗文化学术研讨会(2024)会议论文。
- ⑧⑩⑳谷向乐、任广、翟霖林等:《河南宜阳苏羊遗址》,《中国文物报》2024年2月9日。
- ⑨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 ⑩赵晓军、任广:《深化洛阳地区新石器考古,助力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国文物报》2022年7月20日。
- ⑪洛阳博物馆:《洛阳姁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1期。
- ⑬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 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队等:《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2018—2019年发掘》,《考古学报》2020年第4期。
- ⑯河南省博物馆、密县文化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5期。
- ⑰⑳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135页,第1343—1348页。
- 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1年第7期。
- ⑲袁辉:《楚湾遗址考古实习记》,《光明日报》2025年12月7日。
- ㉑㉒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 ㉓㉔㉕㉖莫韶华、王苑:《郑州清静沟遗址发现四重

环壕 系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仰韶城址》, <https://news.dahe.cn/2025/02-24/1896066.html>。②③郑州市文物局:《荥阳汪沟遗址》, <https://wwj.zhengzhou.gov.cn/province/3181285.jhtml>。④⑤郑州市文物工作队:《青台仰韶文化遗址1981年上半年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尚元昕、魏青利:《2017年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之荥阳青台遗址发掘》,《黄河·黄土·黄种人》2018年第8期。⑥《“河洛古国”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历史》, <https://news.qq.com/rain/a/20200508A0AOTW00>。⑦冯时:《候气

术与律历制度》,《文史知识》2026年第3期。⑧桂娟:《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发现疑似北斗九星祭祀区》,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3/29/c_1122996191。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江南城源:江苏省无锡市斗山史前城址考古发掘新突破》,《中国文物报》2026年4月13日。

参考文献

[1]黄怀信.鹖冠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O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f the Songshan Region During the Yangshao Period

Zhao Baoyou, Yan Tiecheng

Abstract: The Songshan civilization of the Yangshao period directly inherited and evolved from the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Peiligang era.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t key sites in the Songshan region—including Dahecun in Zhengzhou, Qingjinggou in Xingyang, Suyang in Yiyang, Qingtai in Xingyang, and Shuanghuaishu in Gongyi—have provided a rich body of evidence for the region’s civilizing process. These findings illustrate the formation of an agricultural and sericultural society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e emergence of large core settlements, and a key transition of indigenous culture from “settlements” to “state.” Through practices of “observing images to tell the time” and “erecting the center to establish the ultimate standard”, a pathway for constructing political order was opened. Consequently, the civilizing process in the Songshan region exhibits a continuou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characterized by “revering heaven and honoring ancestors, valuing virtue over wealth, prioritizing order, pragmatically adhering to the mean, and sustaining endless vitality.”

Keywords: Yangshao period; Songshan civilization; civilizing process

[责任编辑/启 轩]